

書 評

謝 世 維*

Vincent Goossaert 高萬桑

***Making the Gods Speak: The Ritual Production of Revelation
in Chinese Religious Hist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22, 368 pages,

ISBN 9780674270947

國際學界在 2021、2022、2023 年各有一本重要的扶鸞研究問世。第一本著作為游子安與志賀市子著的《道妙鸞通：扶乩與香港社會》（香港：三聯書局，2021），本書是兩位作者二十多年來對香港、華南及南洋壇堂研究之成果。書中呈現香港乩壇鸞堂的實態，從扶乩的角度去描述香港宗教和社會文化歷史，並進一步探究香港鸞堂在華南、東南亞宗教結社所扮演之關鍵作用。書中也提到廣東所盛行的呂祖扶乩信仰對士人的影響與《呂祖真經》在嶺南的流傳，以及其與扶鸞信仰、呂祖道堂的關聯。作者細膩地討論以潮汕一帶盛行文人鸞壇，當地的扶鸞實踐對香港潮人有顯著的影響，並從香港道堂開始進行討論，仔細闡述扶鸞在神、人溝通之間模式與作用，也探討了香港鸞手的養成和意識狀態以及扶鸞與道堂發展之間的關係。

2024 年 3 月 25 日收稿，2024 年 5 月 23 日修訂完成，2024 年 8 月 9 日通過刊登。

* 作者係國立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教授。

Hsieh Shu-wei,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Religious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第二本著作為高萬桑（Vincent Goossaert）所著的 *Making the Gods Speak: The Ritual Production of Revelation in Chinese Religious Histo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22)。這本書是第一部詳盡研究神啟歷史的英文著作。該書詳述了扶鸞的眾多歷史來源，以及其與道教，尤其是法術傳統之間的關係。這本著作的精彩之處在於對十六世紀末以後扶鸞歷史的敘述。十六世紀末扶鸞出現劇變，萬曆年間（1573-1620）鸞書與乩壇的大量湧現，成為百花齊放的壯觀景象，其中儒生與官員的參與是乩壇廣為擴展的重要因素，並直接導致十八世紀清代鸞書的正典化。關於鸞文正典化的歷程，高萬桑從宗教、社會、政治角度進行深入的剖析，最後探討了太平天國戰爭與民間教派的轉向，對於民間教派末世論在扶鸞文本當中的重要性有細緻的描述。

第三本由荷蘭萊頓大學出版的 *Communicating with the Gods: Spirit-Writing in Chinese History and Society*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23) 一書，著作團隊包括 Matthias Schumann, Elena Valussi, Vincent Goossaert, Wang Chien-chuan 王見川, Elena Valussi, Hu Jiechen, Fan Chun-wu 范純武, Daniel Burton-Rose, Michael Lackner, Zhu Mingchuan 朱明川, Matthias Schumann, Xia Shi, Nikolas Broy, Ichiko Shiga, Li Guoping 李國平, Luo Dan 羅丹, Paul R. Katz 等，涵蓋帝制晚期到當代的扶鸞文化研究，堪稱是集當代扶鸞研究專家於一堂的總合性研究，具有標誌性的學術意義。

這三本著作都強調扶鸞在中國宗教的重要性，從中可以看出，明清時期宗教師不再是心性修練、宗教知識的傳承者，修練的知識教化轉移到文人菁英階層。更重要的是，各式各樣的經典透過文人乩壇中的扶鸞活動而產生，宗教經典也不再限於宗教內部流傳。這些扶鸞經典大多經由民間書坊刊印發行，使鸞書的思想教化快速地在社會各階層傳布。

三本著作中 *Making the Gods Speak* 一書最具企圖心，對中國文化中的神聖啟示進行了全面審視，探討這個未被充分審視的領域，並透過歷史文獻對其進行了追溯。透過各篇章的討論，提供中國宗教當中完備而系統性的「神啟」脈絡考察。

神啟的文本自中世紀早期就已出現，然而大量的神啟文本仍未受到學界關注。這種學術上的忽視是因為人們普遍認為這些文本屬於民間或大

眾宗教的範疇，長期以來在宗教研究領域中處於邊緣地位。然而，在過去的十多年裡，部分學者已經開始關注這個領域。儘管這些研究增強了我們對神啟文本及其在中國宗教歷史中的意義的理解，但仍然有相當的限制。首先，學者們經常關注特定宗教或教派傳統中產生的文本。因此，我們有許多優秀的個案研究，但缺乏更全面和比較視角的框架。此外，過去的學術研究主要分析神啟文本的內容，很少考慮神啟的儀式背景。法國高等學院高萬桑教授的這本新作是多年細緻研究的結晶，彌補過去學界的不足。作者成功地提供了迄今為止對神啟主題最系統化、最全面的研究，大大加深了我們對整個中國歷史啟示儀式生產演變的理解。

中國宗教的一個重要特徵是透過人神交流而產生新的經典。新的神明可與人溝通以創造新的經典和儀式，歷史上古老的神明也透過扶鸞更新其教理，推陳出新。當諸神與人交流或透過降筆書寫新文本時，新的經典就被創生問世。高萬桑圍繞著神啟文本的實踐，從社會背景、教理、教義去考察，廣泛涉獵各式宗教文獻，特別是帝制晚期道教相關經典。在這本開創性的著作中，我們見識到作者廣博的知識。

本書八個章節揭示了從古代晚期到帝國末期的神啟歷史。第一章作者主要介紹一個總體理論架構來解釋人神互動的不同模式，列出了「神啟」產生的多種方式。作者著重在華人世界神啟的歷史，以及從神聖話語的儀式生成中探討啟示活動的發展，並提出啟示生態（*revelatory ecology*）的概念：神啟手段發展與實踐的場域，出於不同目的而產生不同內容，他們各司其職，而且更多是互相補足而不是相互競爭。本書的開頭就指出了中國宗教歷史上神啟的兩種模式：第一種是自發性顯現，神真在沒有任何預警的情況下主動與人互動。這種類型可以採取多種形式來表現，最典型的敘事場景就是在深山偶遇仙真，仙真將神聖的經本相贈，神人互動過程中強調神聖能動性與自發性；與之相反，第二種模式為儀式化的神啟，這種模式則突顯了人的主動性，人們透過程式化儀式召請神靈顯現。

在第二章中作者提供了一種類型學來將不同類型的啟示分類。根據所使用的儀式技術、神啟的場景以及神啟文本的形式和內容的三個標準，作者提出了五種神啟類別的「神啟類型學」。一為「經文類」：具有永恆的特質，沒有歷史語境、超越時空、內容程式化。二為「感遇類」：具備明

確時、地、人，但手段不明確，多半是偶然發生，讀者被告知有關啟示性事件的細節。然而，接收者顯然沒有使用任何儀式技巧來實現這一啟示。三為「附身類」：近現代出現新的類型，具有集體經歷，在附身類型中，神明的降示是透過附身靈媒，某些儀式則是為了讓靈魂附身；四為「觀想類」：透過精確的、精心設計的觀想、存思程序，加上修行者的功德與修持，取決於語境感通，屬於內在經驗而沒有見證者；五為「顯靈類」：透過儀式程序手段讓參與者感知到神靈存在並提問，扶鸞扶乩屬於此類。這種類型的時空資訊相當清晰，高度語境化與歷史化，同時提供永恆的真理；儀式有嚴格的安排與操作，結合召神與附身，是帝制後期的神啟特徵。前四種歷史較長，第五種發展較晚。前三種強調神的作用；後兩種強調人的作用，但只是程度之別，人在其中的作用從不缺席，且越來越普遍，人們的接受程度也會影響啟示文本如何表現自己。五種類型可理解為神明與人的距離，也對應於不同神格。這種分類法有助於學者們根據操作條件、性別動態和社會地位進行細緻的辨別。

確立本書的分析基礎後，作者提出中國神啟生產的歷史藍圖。在這些分析工具的基礎上，作者接下來提供了動態的敘述，解釋神啟歷史中具有深遠意義的幾個轉折點。儘管啟示最早出現於三世紀的中國，作者在本書中主要關注的是近代以來的變革，尤其是第十至十五世紀。第三章關注的是道教的儀式傳統如何促進神靈的臨在。作者指出神啟歷史第一個重大變化發生在十一世紀，出現新的神啟技術，創造一種新型的神啟，俗稱「道法」，具有驅邪的性質，由一群稱為法師的特殊儀式專家所實踐。宋元時期法師採用道法儀式來召請神將，同時法師的驅邪儀式會運用到靈媒，而靈媒又反過來使受眾可感知到啟示或者療癒。此處的創新之處在於，法式的控制力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啟示的整個過程，不僅確保神明出現，也驗證了法師召請神將時的真實性。

第四章和第五章討論了十一至十五世紀期間的降筆書寫，首先概述了所使用的技術，然後分析了所揭示文本的類型。降筆的源頭為扶箕與迎紫姑。歷史上的紀錄可以發現沈括、洪邁、蘇軾、陸遊等文人曾參與這樣的儀式。此時期扶鸞扶乩與其他儀式產生結合，例如醮儀結束前會行使神判、降下啟示、詢問命運等等，而喪禮時會詢問儀式是否圓滿等等。

十二世紀末四川開始出現文昌降筆的啟示，如《太上無極總真文昌大洞仙經》、《梓潼帝君化書》等；此時降筆會使用鳳鳥鸞筆，在降筆亭中，將鸞筆懸在椽子上，然後在房中自動書寫，完成後人們進房觀報應，降筆的啟示開始公開流通。在這個階段，「壇」成為一種組織團體，由於道法傳統的創新，法師以壇為基礎進行道法儀式，扶乩屬於道法傳統的一部分，法師執行扶乩去進行儀式服務。作者認為這些壇跟制度化的道教團體沒有本質上的分別，因為壇也可以進行道教儀式，具有道教的儀式空間，可進行醮儀、治療、占問等。宋元時期法師聲稱扶乩是他們的專利，《道法會元》與《法海遺珠》中皆可找到扶乩儀式的指導。

第六章探討晚明的轉變，著重於明末扶鸞的「黃金時代」，以及新型態「乩壇」的出現，這些新的現象使得神啟示不再專屬某些專業人士。儀式生產的第二次重大轉變發生在十六世紀末至十七世紀初，可以從幾個層面來辨別。首先，鑑於之前神啟書寫是在法師之類的儀式專家的掌控下進行的，新的轉變是由受過教育的在家眾組成的各色團體，其中以儒士為主。其次，十六世紀末隨後幾十年內出現劇變：萬曆年間（1573-1620）鸞書、善書與乩壇的大量湧現，標誌此時期最重要的轉變。所謂「乩」是指以 Y 字型或 T 字型木製書寫工具來進行的新型儀式活動。「乩壇」為志願性、開放性的士人團體，旨在修身與救世，透過降筆與印刷傳播善書與經典。乩壇的特徵是新的啟示內容以及扶乩團體的新社會角色。乩壇出現新的神明，以呂祖為代表。其中《三藏真詮》為 1547 至 1572 年陸西星與呂祖交流問答的紀錄，從「書」、「索紙」、「篩」等字看出扶乩的性質。以篩、附身或觀想形象的方式降臨，可看出不同類型的神啟。呂祖信仰呈現豐富的降筆文本，包括詩句、敘事、內丹教導、經文註解等。

透過扶乩開始出現大量文類。早期善書為通過書寫或降筆而成的道德教化文本，主要在內部通行，例如《太上感應篇》、《樂善錄》、《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為善陰騭》、《明心寶鑑》等等。另一種是「語錄」，記錄信仰與實踐，關於自我修行的指導，諸如內丹、靜坐、醫療、養生等實踐。而降筆經文的增加，一方面提升啟示神明的地位，並且在經文中闡釋菁英的末世論。

乩壇的集體性聯繫到士紳菁英群體的崛起，這些受過良好教育的士

人，為了建立社會角色以及個人的修行，加上萬曆年間識字率增加，市場經濟提升，士紳菁英重視個人修養，大量參與宗教活動，致力為社會謀福祉，於是乩壇成為明末以後新興起的組織團體。首先，在外功上以傳道為主，其實踐方式是透過印刷來廣泛傳播啟示錄文本、提倡道德改革、投身贈醫施藥，強調慈善捐助，透過捐款讓受益者遵守道德規範，藉此達到善書的效果，以道德改造來修身救世。其次，乩壇啟示的神明為過去不為人所知的神靈，通常與宋元道法儀式無關，其中最著名的是呂祖。再者，啟示內容也發生了重大變化，尤其是道德書籍成為帝制後期扶鸞的核心。最後，在乩壇的環境中，一種更簡單、更容易理解的扶鸞形式與儀式獲得普及，在家居士可以自行操作，不再依靠道士、法師來執行。綜合起來，作者強調這些變化指向神啟書寫的「世俗化」：扶鸞逐漸受儒士、居士團體青睞，廣受歡迎。

作者特別強調乩壇的兩大特徵：第一個是印刷，宋代印刷技術與文化刺激降筆，降筆內容以外聘商業出版社代印的方式發行，或由乩壇成立善書局來印行，由此將原本秘傳的宗教知識在萬曆時期後大量公開；乩壇穩定的產出經文與鸞文，再加上詳細的扶鸞團體發展紀錄、靈驗史等等，形成豐富的宗教文本。第二個是儀式服務，包括懺儀、疏文、誦經、拜斗、醫療等。乩壇成員很多本身就是醫者，同時也執行治療儀式如驅邪、符咒、降筆乩方或編整醫書，以應對當時的疾病與瘟疫。乩壇的降示的另一個核心則是內丹修練的指引，屬於性命的修練，是菁英日常修持的精神指引。

第七章展示了神啟文本和它們所代表的宗教世界，如何透過編纂「全書」以及朝廷敕封而得到鞏固。清朝建立後，由菁英領導的乩壇在整個帝國推廣扶鸞實踐。在十八世紀，有兩個交織的現象證明了這一點：首先，各種扶鸞團體互相競爭，以收集大量的啟示文本來編譯正典，成為所謂的《全書》。作者提出清初到中葉 1700 年至 1858 年間鸞書經歷「正典化」的過程。所謂的「正典化」指的是為了救世的權威而為神明編纂「全書」的神聖文本並加上朝封的神聖性格。

這種「全書」由一個或一群神明啟示文本編輯為彙編，這類的全書目的並非包羅萬象，更重要的是區分正統與異端。其中包含三個不同但相互關聯的動態：社會、教義、政治。其中最顯著的是呂祖、文昌、關帝信仰。

其次，作者關注一系列敕封運動，仔細考查文本與敕封。清代的菁英修行者，也包括官員在內，成功遊說朝廷對其信仰的神明予以敕封。透過不斷敕封，將神明提升到天界官僚的崇高位階。透過朝廷將神明予以敕封，啟示更容易被接受，作者敏銳觀察到政治與宗教話語饒富興味的交織。此處作者的研究非常有力揭示整個扶鸞運動的影響力。

在最後一章中，作者思考了太平天國戰爭對啟示文本的影響。十九世紀是最後一個值得關注的轉折點的歷史發展，其中更大的背景是太平天國戰爭，引發了廣泛的社會動亂。當時善書普遍存在末世情景，最典型的場景就是在末劫時期，無生老母試著將信眾帶回天家，而透過扶鸞將各種救劫文本傳授人間。在太平天國背景下，各教派團體將扶鸞作為啟示的主要手段，隨著越來越多的團體採用扶鸞並將其與現有的方法相融合，導致扶鸞方法和途徑的交叉混合。其中引人注目的是菁英和教派的扶鸞團體，從中產生的混合體末世論情景。

對熟悉中國宗教的讀者，本書的鋪陳相當實用，有助於我們更全面的理解中國宗教史，因為作者涵蓋了許多領域，以歷史作為框架，陳述神啟的多種面貌，最後三章進入高潮，作者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論證，具體陳述扶鸞書寫和神啟文本如何成為塑造帝制晚期宗教生活的核心。其中諸多內容可以激發未來的研究，第八章則對於我們如何看待太平天國戰爭的宗教層面做出了重要貢獻。

本書貫穿歷史的脈絡就是作者認為扶鸞自近代以來逐漸「世俗化」的過程，作為儀式專家的法師逐步被在家居士取代，進而成為擅長神啟儀式的主角，作者因此認為道教法術驅邪的模式為扶鸞奠定了基礎。

本書的優勢是透過「道教」歷史對扶鸞傳統進行歷史追溯，但是本書的問題也是在於「道教」的視角，將道法儀式以及道法的扶乩納進神啟書寫當中，呈現線性脈絡化是本書可以再商榷之處。作者在書中也指出，道教內部並不贊同扶乩。南宋呂元素《道門定制》：「若降筆所傳，皆未可信。」「降筆為教門之魔而鸞字道童不曉科教。」南宋白玉蟾《海瓊白真人語錄》：「或以鬼仙降筆而謂秘傳，……邪師過謬，非眾生咎，一盲引眾，迷以傳迷。哀哉！」道教編集如《天壇玉格》、張宇初《道門十規》等明確排斥扶鸞與扶乩；一些道法派別諸如清微派，委婉地批評扶乩為低級道術。

如本人所研究，宋元道法的附身考召之法與密教有某種關聯，與中國宗教傳統的神啟方式不同，而且在道法考召盛行的宋元時期，士人已經在透過紫姑神獲得神啟，在明清時期，道法考召等儀式仍盛行不墜，換言之，這是兩種平行存在的召神模式，若放在線性歷史發展脈絡上，容易造成誤解。如果進一步將「世俗化」套在這種線性思維之上，認為作為儀式專家的法師逐步被在家儒士取代，進而成為進行降筆儀式的主導者，這樣的理解恐怕過於簡化歷史的複雜性。事實上，如同作者意識到的，中國宗教本來就有各式各樣的召神方式，作者書中也有提到六朝到唐代的三皇文傳統，也就是方士傳統也有透過八史來降神等等。這些降神方式各自發展，平行存在於社會不同層面。在今天臺灣的民間仍然可以看到各種降神啟示的方式，包括扶鸞、問事、附身、降駕等等同時並存，甚至在一個廟宇空間，以各自的方式來服務信眾。如果過度用線性發展史觀來看待這樣的傳統，則容易忽略其多元性、同時性與複雜性。不過，本書提供了極豐富的材料，開展了全觀式的宗教視野，讀者可以藉由這些材料與洞見，去體會中國宗教的複雜與深邃，進而去反思書中的諸多推論，甚至藉著作者開啟的各種面向，接著深入去探尋研究。本書是一個極具開拓性的起點，等待學界繼續耕耘深究。